

# 周敦頤「濂溪」命名爭議及其影響考

姜 龍 翔\*

## 提 要

此文旨在探明周敦頤之所以命名濂溪的源由及意涵，並針對傳統自製命名及取名故里兩種說法進行考察。除分析兩種爭議形成的過程，亦論及二說在後世引發的影響。此文發現朱熹推論取名故里是不忘其本的表現，乃融入對自己父親的思念，帶有個人情感意圖，這種心理推測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周敦頤身上。另外，黃庭堅提出的自製取名說，則蘊涵周敦頤兩個兒子對父親的思念，並表達周敦頤以濂字標榜廉節的新義。此文又藉由唐寫本《玉篇》殘卷的記載，推導濂字非周敦頤新創。總合這兩種結果來看，濂溪應為周敦頤故里舊溪之名，但周敦頤取用之後卻賦予新義，創造出具有以廉德自我標榜的價值意涵。此文在所論議題外，亦提供學界少有注意到的周敦頤二子相關資料，分析出二子對周敦頤聲譽傳播之貢獻。另外，也探討文人對周敦頤道州故里所開發出來的各種景點傳說，對於周敦頤的形象及爭議問題亦進行釐清，相關成果均可作為提供學界研究周敦頤對後世影響之參考資料。

**關鍵詞：**周敦頤、黃庭堅、朱熹、周壽、周燾

---

本文於 109.01.06 收稿，109.09.16 審查通過。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2012\_(71).0004

#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Name Lianxi from Zhou Dun-Yi and its Influence

Chiang, Lung-Hsi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the name Lianxi from Zhou Dun-Yi and investigate the two theories whether the name was made by himself or from the name of his hometown.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the naming controversie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Zhu Xi's way of adopting the notion of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s of his ancestors does not apply to Zhou Dun-Yi's case. In addition, Huang Ting-Jian's statement includes the thoughts of Zhou Dun-Yi's two sons for their father, and expresses Zhou Dun-Yi's integrity.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deduces that Zhou Dun-Yi did not create new words so that the name of Lianxi was from hometown. In sum,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Lianxi is a small stream in Zhou's hometown, and Zhou Dun-Yi gave new meaning to it.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referenc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bout Zhou Dun-Yi's two sons, and analyzes his sons' efforts to spread Zhou Dun-Yi's reputation, which is the direction that future study could furthermore explore into.

**Keywords:** Zhou Dun-Yi, Huang Ting-Jian, Zhu Xi, Zhou Shou, Zhou Tao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周敦頤「濂溪」命名爭議及其影響考

姜 龍 翔

## 一、前 言

周敦頤（1017-1073）別號濂溪，然此號之產生，則有一段爭議。黃庭堅（1045-1105）提出濂溪乃周敦頤以「廉」自許，加上水部偏旁，自行創制取名而成；朱子（1130-1200）則採用友人實地探訪所得，提出濂溪為周子故里之名，周子刻意採用，乃不忘其本之意。憑藉著朱子理學權威身分，此說漸成主流，學者多認為周敦頤是要志鄉關於目，不認同自箴取名之說。對於這個問題，現今學界則有多篇重辯濂字命名之文，反駁朱子一系說法，如吳懌說：「濂溪故里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為符合封建統治『禮』的附會之說，以示人們不忘其本，有利於統治人民。而名『廉』自箴，以『廉』為媿水成溪名，以『濂溪』為自號，才是周敦頤的本意。」<sup>1</sup>張官妹也說：「『濂溪』原為廬山的居前小溪命名，而不是道縣家鄉的小溪之名，道縣的『濂溪』應是沿用了廬山的溪名。」<sup>2</sup>分析他們的論證，均以為周敦頤本人及其與時人交游詩文中，皆未見有將濂溪作為家鄉故里名的證據，孔煜華便說：「『思鄉』說最大的硬傷在於對周敦頤本人的言論視而不見。」<sup>3</sup>他們普遍認定濂乃周敦頤自創之字，欲

---

<sup>1</sup> 吳懌：〈周敦頤「濂溪」之名考辨〉，《南昌高專學報》2005年第5期，頁10。

<sup>2</sup> 張官妹：〈「濂溪」之名緣由〉，《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5年2月），頁34。

<sup>3</sup> 孔煜華：〈濂溪辨〉，《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22。

以廉節自箴，並非沿用故里舊有溪名。

這些新論言之鑿鑿，也提供對此議題再度深論的契機。首先，黃庭堅雖提出濂字為周敦頤自創，但支持故里說者指出曾見過唐寫本《說文》及《玉篇》有濂字，故非周敦頤首創，這種說法不能成為依據嗎？此外，朱子宣稱是經過友朋實地探訪考察而得，但朱子學養深厚，眼光敏銳，為何他會輕易相信間接證據？有什麼內在思維影響著他？取名問題雖看似無關緊要，但宋元以後儒者論及周敦頤時，往往把濂溪故里當成評述周敦頤時必須要先澄清的要素，他們為何會特別重視這個問題？反映出何種文化關懷？本文便欲在上列問題意識中，再次展開對濂溪取名來源的探討，除釐清兩種說法產生的源由，並對由此開展出來對濂溪景點增添的文化傳說進行考察，最後亦將針對濂溪命名根據的爭議，提出合適的解答。

## 二、濂溪命名說的爭議過程

周敦頤曾在廬山下構築書堂，命堂前小溪為濂溪，命書堂為濂溪書堂。但誠如前言所說，周敦頤何以要取名濂溪？濂溪之名的來源為何？宋時產生兩種說法，分別是黃庭堅主張的「媿水而成」以及何弁提出的取名故里說。

### （一）黃庭堅的「媿水而成」說

最早論及取名問題的是黃庭堅，他曾應周敦頤二子周壽（1057-？）、周燾（1062-？）請求，作詩詠周子德行，在序文中提出濂字為周子所創。其〈濂溪詞并序〉云：

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sup>4</sup>

<sup>4</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宋集珍本叢刊），第8冊，卷7，頁15上。

周敦頤為荊湖南路道州營道人，道州又稱春陵，其位置相當於今湖南省南部，鄰近廣東及廣西。但根據序文的說明，周敦頤中年時曾動歸隱之念，欲終老於湓城。湓城就是漢時的柴桑，隋唐又稱潯陽，北宋時為九江，屬江南東路之江州，廬山位於九江南郊，濂溪即在此處。據黃庭堅所說，濂字乃周敦頤用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之字。所謂平生所安樂者，乃指周子〈題濂溪書堂〉中所說：「吾樂蓋易足，名溪朝暮侵」，<sup>5</sup>是以所安樂者就是濂，再加上水部，便成新創之濂字，乃因溪流之名以寓其樂於廉節之意。

## （二）何弃的取名故里說

依黃氏之說，濂字被視為周敦頤自創之字，具以廉自儆之意。但這種說法卻被朱子否定，朱子在〈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中說明原委：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為字，為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為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sup>6</sup>

朱子原本採信黃庭堅自製說，後來受到何君影響，方認為濂溪乃周子取用故里之名，非以濂字湊合水部而得。何君為何弃仲，或稱何弃。清鄧顯鶴（1777-1851）《沅湘耆舊集前編》載：「弃仲，一作何弃，字農父，營道人，亦元公邑子也。」<sup>7</sup>《明一統志》載北宋末有一何齋，是徽宗政和年間進士。其云：「營

<sup>5</sup> 同前註，卷6，頁28下。

<sup>6</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第8冊，卷81，頁4010。

<sup>7</sup>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清道光24年鄧氏小九華山樓刻本），第1690冊，卷19，頁13上。

道人，後更名棄。登政和進士第。性剛介，議論不屈，倅隨守廉，俱擅聲稱。」<sup>8</sup>然則何齋即為何弃。但這些皆為明清之後文獻，未知所據。孔煜華甚至懷疑何弃是個虛構的人物，他說：

遍查正史和古今道州志書，都對他失載。清代光緒《道州志》介紹了唐代以來進士、鄉賢、名士等何姓人物近二十人，就是沒有何弃仲。其中載宋代有位叫何齋的人，頗有官聲。「府志更名弃，登政和進士第，……」，與何弃仲「一名何弃」同名，所處時代也不矛盾。但沒有說他字農父，也沒有說他寫了〈營道齋〉或其他作品，至於府志更名依據也不得而知，因此很難將他們看做同一人。<sup>9</sup>

孔煜華指何弃傳世作品僅〈營道齋詩并序〉，難以證明真有其人，說法也找不到其他證據支持。不過，明人姚曷（1443-？）《永州府志》即收有名為何弃農父〈遊九疑賦〉，名、字相同，九疑山則在道州境內，顯示其非僅作一首無根據作品的虛構人物。<sup>10</sup>且齋有黍稷之義，鄭玄注《周禮》「六齋」便云：「齋，讀為案。六案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sup>11</sup>齋既可指黍稷，後來更名為弃，明顯是取周始祖后稷名號更名，故又謂農父，亦是就后稷為農業之祖的傳說來取字。這樣看來，何齋就是何弃，應該真有其人。

何弃所作〈營道齋詩并序〉，最早提出濂溪為周子道州故里村落之名，其序云：

舂陵郭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有子曰敦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

<sup>8</sup> 明·李賢：《明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卷65，頁38下。

<sup>9</sup> 孔煜華：〈濂溪辨〉，頁20。

<sup>10</sup> 明·姚曷：《永州府志》（明弘治8年刻本，約西元15世紀），卷9，頁6上。全文影像收錄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址：<https://www.ndl.go.jp/>，瀏覽日期：2019年9月18日。

<sup>11</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大化書局，1989年，嘉慶20年重刊宋本），卷19，頁4上。

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夏公敬慕之，每稱獎其子壽、燾。燾即次元，亦為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唯多其廉退；脩水亦止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不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甫數舍，坡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託宿於茲，且有墳隴留人。比創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話前事，賦詩曉兒曹。<sup>12</sup>

何奔與周敦頤同邑，因地近之便，遂知其事。他說周敦頤故里道州有濂溪村，乃周家世居之所。周敦頤取故里濂溪命名，以志鄉關在目。至於文中提到的脩水江夏公，就是黃庭堅。他不只批評黃庭堅與蘇軾不曉周敦頤取名用意，就連周敦頤兩個兒子，也被他指責不能準確傳達父親志意。

### （三）故里實地探訪的相關證據

上述兩種說法雖有差異，但問題的本質似乎不足以構成太大的爭議。朱子一開始看到何奔序文時，雖受其影響而改變想法，然尚不敢大膽提出修正。乾道二年（1173）編輯《伊洛淵源錄》時，只將何奔之言附錄於遺事中。一直到張栻（1133-1180）以周敦頤墨帖後及家譜示之，並得春陵本地人胡良輔亦以周子故鄉父老傳言為據，再加上友人鄒莛也親訪其地，提出證言，終於得出周敦頤取故里舊溪命名乃不忘其本的結論。憑藉著朱子的權威地位，此說影響深遠，使得幾乎無人再採用「媿水而成」的說法。

首先，張栻於孝宗淳熙二年（1175）時知靜江府。靜江即今廣西桂林，毗近春陵營道縣，於是有意尋訪周敦頤故跡行實。其〈跋濂溪先生帖〉云：

栻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尋訪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者，持二帖及周氏家譜石刻來。良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樓田。……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蓋舊有此名。先生晚

<sup>12</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17上-18上。

築廬山之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示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父老相傳，尚能道先生此意也。<sup>13</sup>

胡良輔是周敦頤的姻族，他指出周子取名自故里的原因，有不忘其本之意，他也表明這是濂溪家鄉父老相傳的傳聞。除張栻的說明外，朱子又受到另一位朋友鄒粵親訪濂溪舊廬證言的影響，〈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又云：

近邵武鄒粵官舂陵歸，為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至字之為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粵嘗有文辨說甚詳。<sup>14</sup>

朱子前已得張栻等人的資料提供，近又得鄒粵親訪之說，見聞皆相合。並且推測濂字乃受唐元結（719-772）取名七泉遺俗之影響，這也等於說明為何在這鄉里之間能夠產生如此附庸風雅的名號。於是更增添朱子的信心，其後便轉向採用濂溪名號出自故里的說法。

朱子說鄒粵另有文辨說甚詳，此文即〈游濂溪辭并序〉，鄒粵於文中說得更為堅決：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宦遊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詩於山谷，避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不應媿水以明其廉。其說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粵觀之，俱失也。粵廩粟道州，考濂溪頗詳。因暇日遊焉，訪先生之遺跡，且悼世人之惑也。<sup>15</sup>

鄒粵因任職道州，得以親訪濂溪故里，遂證明取號故里的傳聞不虛。不過鄒粵

<sup>13</sup> 同前註，卷6，頁19上-19下。

<sup>14</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第8冊，卷81，頁4010。

<sup>15</sup> 宋·周敦頤：《元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18上-19上。



另提出兩點需關注的問題，一是有近世大夫謂濂溪本應作廉溪，是周壽、周燾二人為避黃庭堅叔父之諱，遂加水旁求詩，等於間接誤導黃庭堅，才造成這樣的爭議發生。另外，鄒勇又批評林栗在〈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中論辨周敦頤以濂取名，於字義不妥之說。他在詩中便強調要特別鍼砭這兩種說法，並且主張故里濂溪是受元結影響而取名，詩云：

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唐之時。元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  
 濂與洙沔兮，貴七泉而為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  
 義殊而非類兮，爾奚恣濂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洙與直亦參差而不  
 齊。故濂者以德而媿水兮遠矣，昔人之所貽。<sup>16</sup>

從鄒勇及朱子等人的意見看來，他們認為濂溪確實是周敦頤家鄉本來就有的水名，並非刻意造字而成。

南宋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營道知縣龔維蕃重修濂溪祠，亦進行探考，其〈道州重建故祠記〉有云：

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群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  
 其後訪於鑰，盡閱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於鄉鄰族黨，始得其實。溪  
 流清泚，地勢平行，岡壠丘阜拱揖合，其左曰龍山，古曰豸嶺。山川之  
 秀，實鍾于是。……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  
 其用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  
 至南軒張公、晦菴朱公，嘗略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  
 以為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牒契券，始究原委。<sup>17</sup>

龔維蕃檢閱當地累世契券及〈大富橋記〉，<sup>18</sup> 確定營道自古即有濂溪，並非周敦頤首創。這樣的證據究竟可不可靠？前言中張官妹便認為這是營道後人因慕

<sup>16</sup> 同前註，卷7，頁20上-20下。

<sup>17</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卷9，頁365。

<sup>18</sup> 龔維蕃所見〈大富橋記〉今已佚，但南宋度宗咸淳七年時，趙櫛夫又寫〈大富橋記〉，今存，二文並不相同。

濂溪之名而後取的，但周敦頤生前只是一介官吏，縱使名聲不菲，但也不至於天下聞名。張栻〈道州重建先生祠記〉便說：「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sup>19</sup>朱子亦曾撰〈劉子和傳〉，有載當時劉子和與學生的一段言談紀錄：

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為哉？」命悉徹去，而更為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sup>20</sup>

趙公乃趙抃（1008-1084），曾與周敦頤交善。從當時諸生只知趙抃不知周子來看，周敦頤之名確實未顯於世。胡適曾指出欲辨古人作偽之可能，必須要探明其是否有作偽動機。因此，在周敦頤名聲未顯的情況下，若說故里人對他懷念不忘，改濂溪為故里名，欲沾染其光彩，並刻意造出契券、家譜，以欺瞞世人，著實難以令人相信。

朱子及鄒粵都提到濂溪應與元結〈七泉銘〉的淵源有關。元結將道州之泉水取名為漙泉、淙泉、汧泉等，雖有水字偏旁，但主要取義於惠、孝、方等道德條目。另外尚有〈浯溪銘〉、〈灑溪銘〉等，也是以偏旁立義。如灑溪乃因灑與讓字偏旁相似，可附加以謙讓之義，故其〈灑溪銘〉云：

灑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灑溪。若天下有如此似讓者，吾豈先灑溪而稱頌者乎？<sup>21</sup>

此說受周敦頤肯定，於是〈濂溪書堂〉便採其意以名書堂，其詩首尾有云：

元子溪曰灑，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欽。……吾樂蓋易足，名溪朝暮侵。元子與周子，相邀風月尋。<sup>22</sup>

周子既取法於元結灑溪以名濂溪，便是要強調偏旁之廉，故詩歌最末所言易足

<sup>19</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10，頁33上。

<sup>20</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第8冊，卷98，頁4810。

<sup>21</sup> 唐·元結著：《新校元次山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頁90。

<sup>22</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6，頁28上-28下。

之樂，乃以濂為樂，以此名溪而朝暮親近之，確實有呼應元結之意。

然此詩相傳至今已有多個版本文字上的出入，造成對濂溪問題的誤解。上舉文字乃依宋刻本《元公周濂溪先生集》，後世版本則多有差異。清李紱（1673-1750）曾整理各本文字差異云：

此詩以《宋元詩會》所錄者為主。先生原集不可見，今世所見者，惟嘉靖、萬歷年間鹿洞本，與《詩會》同。若近日吳中本及張清恪刻本，則中間字句多異，而最誤者，則詩題與名濂自箴句也。題本作濂溪書堂，而吳中本及張本並誤作灑溪書堂，蓋因首句元子溪曰讓而訛之。又訛讓為灑，不知周子從未有灑溪書堂，而《廬山志》亦從無此堂名也。至名濂以自箴句，則吳中本訛為名濂朝暮箴，語雖稍拙，猶不失先生名濂自箴之意。張本乃改為名溪朝暮侵，歷考舊本，從無此語，不惟失原詩之意，併詞義亦不可解。其意蓋欲回護《伊洛淵源錄》所引何仲農故里舊名之誤，不知其蹈於作偽，乃心勞而日拙也。……結句之訛，更俗不可耐。周子固未必自稱子，元子古人，安能相邀哉。此皆流傳訛謬，未暇深求，而以視先生元作之佳，則失之遠矣。<sup>23</sup>

據李紱所舉文字來看，張清恪（1651-1725）刻本除詩題作〈灑溪書堂〉為誤外，其餘內容幾與宋刻本相同。張清恪即張伯行，張本乃其於康熙四十七年所編之《周濂溪先生全集》本。但李紱未見宋刻本，又不信張本文字，以為張本文字令周詩顯出俗不可耐之淺率感。但觀李紱以元子古人，安能相邀之諷作為批評，便可知他毫無想像力，所論亦未可據。若作反向思考，周敦頤原詩或許正是被李紱這類人所誤解，遂漸修改成看似典雅的形式，因而造成文字版本歧異。關於周敦頤全書之版本計有十餘種，本文則主要依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為據。此宋刻本乃目前收錄周敦頤文集的最早版本，始刊應在南宋咸淳年間。宋刻本〈濂溪書堂〉表明周敦頤欲取法元結取字命名之意，即使宋刻本「名濂以自箴」作「名溪朝暮侵」，但也非如李紱所

<sup>23</sup> 清·李紱：《穆堂別稿》，《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清道光11年奉國堂刻本），第1422冊，卷50，頁24下-26上。

說詞義不可解。《說文》釋侵為「漸進」<sup>24</sup>之義，宋玉〈風賦〉則有「侵淫谿谷」<sup>25</sup>之文，均可證「名溪朝暮侵」在詞義上是可成立的，亦即以廉名溪，朝暮浸淫之意。

目前主張自製取名說者的最重要根據，便是認為在周子個人詩文中皆見不到有取自故里的證據；但同樣道理，從詩文中亦未可見到周子有說明自己創造新字的說法。雖然濂溪是做灤溪，但元結的灤字並非造字，而是本有之字。即使他的〈七泉銘〉有部分自創的字，也不足以據此就認定濂字為周子自創，反而應該嘗試朝〈灤溪銘〉將灤字賦予新義的方式思考。

### 三、支持故里說的原因分析及其影響發展

朱子接受當代文人的考察後，正式確認濂溪乃取自故里，以示不忘其本，於是朱子後學亦承其說。如度正（1166-1235）《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便記：「先生既愛廬山之勝，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其故鄉之名，築室其上，是為濂溪書堂。」<sup>26</sup>度正以為濂溪既是故鄉溪流之名，便代表有思鄉情緒，於是在《年譜》中也說：

先生常寓潯陽，愛廬山之勝，貧不能歸，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之名，築室其上，名曰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為濂溪先生。<sup>27</sup>

<sup>24</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八篇上，頁20上。

<sup>25</sup>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7冊，卷1，頁35上-35下。

<sup>26</sup> 宋·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年表〉，頁4上。

<sup>27</sup>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99-100。據作者校點說明，乃依清光緒13年賀瑞麟編輯《周子全書》本為基礎，參照其他版本，校點而成。

度正添加貧不能歸，不忘父母之邦的心理推測。他並對黃庭堅之說提出質疑：

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川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蓋春陵溪數之名，大率多從水，如洄溪、忠泉、泮泉之類，濂溪亦然耳。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專指清廉為義，若先生名之以自況者，不知何也？<sup>28</sup>

除心理因素外，度正又補充營道〈大富橋古碑記〉的證據，確認營道有濂水，並非如蘇、黃所說以清廉自況之義。雖然此問題似乎只是單純的人物行實考察，但度正在年譜一開篇便討論名號問題，接著又於多處強調周敦頤道州故里為濂溪，足見他相當重視此爭議。

朱子、度正等雖指出命名濂溪有不忘其本、樂其所生、志鄉關在目的用意，但周敦頤為何未選擇返鄉定居，歸葬兆域？也成為需要澄清的問題。度正說他因貧困而未能歸故里，應是主觀推論。明人王汝賓認為移居廬山，本來就是周敦頤預定安排好的行程，〈刻濂溪集跋〉云：

或者謂先生貧不歸，非知先生者也。先生雅志林壑，不為世故所窘束，凡遊歷所在，遇佳山水，輒盤桓數日而忘去留。當時請移南康軍也，亦以此嘗過江州，上廬山之麓，酌溪水而甘之，即不忍去。遂構書堂，而揭故里之名名之。觀其語友之詞，移太君夫人之窀穸。則先生來止於此，寔皆預定之意也，為貧之故哉？<sup>29</sup>

從周敦頤的行事步驟來看，他確實可能早計畫好要移居。那麼為何他未選擇要返回故里？周敦頤父親周輔成於大中祥符八年中進士，隔年周敦頤即出生。周輔成在中進士之後，必然會被派官，《明一統志》載周輔成：「世居營道之濂溪。登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多善政，終於桂陽令，累贈諫議大夫。」<sup>30</sup>既有歷官，又終於桂陽，大概自登第後即四處任職，未必能居家；而在周輔成逝世後，

<sup>28</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3下-4上。

<sup>29</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7，頁296。

<sup>30</sup> 明·李賢：《明一統志》，卷65，頁38上。

妻兒即投靠舅氏，也未在營道落地生根。梁紹輝便推測周母鄭氏：「婚後隨署生活的可能性大，故周敦頤的童年時代在營道家鄉的實際時間不會太長。」<sup>31</sup> 若然如此，周敦頤對營道的感情便不會太深刻，以致於他最終未選擇要回歸故里。所以梁紹輝又據此批評貧不能歸之說：

聯繫他嘉祐六年於廬山購地築房，治平四年回道州處理家產，分明是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哪來的「貧不能歸故里」？其所以要如此彌縫，是因為去父母之鄉有違古訓，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罷了。<sup>32</sup>

度正等人之所以提出貧不能歸的說法，正是因為卜居異鄉這個舉動違反不可去父母之邦的古訓，是要為周敦頤避諱。

中國文人致仕後告老還鄉，武人退伍後解甲歸田，都是為回到自己所屬的宗族，以期歸葬祖墳、入祀祠堂，體現落葉歸根的重要傳統。當然有些學者也認為這背後含有經濟因素，例如錢穆便說：「一輩士大夫智識分子，還可退到農村做一小地主，而農村文化，也因此小數量的經濟集中而獲得營養。」<sup>33</sup> 退休致仕的官員，帶著某種經濟實力，回歸鄉里，既可形成鄉賢、鄉紳的士紳階級，也算得上是一種尊榮。《漢書》載武帝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sup>34</sup> 可見功成還鄉、告老還鄉，通常是仕宦者最後的理想歸宿。只不過這種理想，在後世文人身上，偶有因特殊情況致其未能實現者，便不免會引起他人質疑。明人張以寧（1301-1370）〈石室山房記〉便云：

夫古者於鄉不去也，有故而去，則哭於墓而行，重之也。蓋夫子父母魯也，而恒稱曰：吾宋人。先世所本，豈遽忘之哉。後之世田弗井授，士無土著，縉紳左丘隴東西南北，託處始弗常。唐韓公昌黎，燕人也，而家於鄧。宋杜祁公，越人也，而家於睢陽。吉之歐陽、眉之蘓而于穎、

<sup>31</sup> 梁紹輝：《周敦頤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2。

<sup>32</sup> 同前註，頁57。

<sup>33</sup>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9年），頁72。

<sup>34</sup> 漢·班固：《漢書》，《百衲本廿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影印宋景祐刊本），第4冊，傳34上，頁12上。

于常。若此者，皆是也。槩以古之道，其有惻於其心者乎。故周元公之僑於南康也，南康無濂水也，公以舂陵之水姓其溪焉，則猶夫子意也。<sup>35</sup>

張以寧認為透過井田等土地政策制度，可以將人與土地連結，如此便會有重鄉安居之效果產生。但後世士人不著於土，託處無常，便破壞了這種傳統。他舉韓愈、杜衍、歐陽修、蘇軾等人為例，認為他們均離鄉外居，不合古道。惟周敦頤雖僑居於南康，卻能標榜以家鄉水流之名，也可算是表達出孔子不忘先世之本的用意。張以寧的〈石室山房記〉是為時人王伯純而作，其文開篇便說：「石室山房者，晉人王伯純甫名其僑於楊之居也。石室者何？晉屬邑洪洞之鎮也。居楊而名晉者何？禮不忘其本也。」<sup>36</sup>王伯純故鄉在山西平陽郡，石室為其屬邑洪洞之鎮，但後來王伯純僑居於楊，卻用故鄉石室之名命其居室，張以寧認為這與周敦頤標榜故里之名的用意相同，皆是不忘本的表現，明顯是受朱子及度正的影響。

### （一）朱子支持「不忘其本」說的心理探索

不忘本是朱子對周敦頤取名故里用意的重要結論，雖說是受友朋親訪的證詞影響，但這種心理原因的推測若不能在周敦頤本人文字中找到證明，就很可能只是朱子等人自己的主觀體會。「不忘其本」、「樂其所自生」出自《禮記·檀弓上》：「太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sup>37</sup>〈檀弓〉引太公為例，指出他雖被分封到山東，但後世五代子孫，依舊反葬於周，以落葉歸根的方式，表現不忘其本的禮意。正如狐死首丘也是不忘本的仁心表現，《晉

<sup>35</sup> 明·張以寧：《翠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6冊，卷4，頁23下-24上。

<sup>36</sup> 同前註，頁23上。

<sup>37</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大化書局，1989年，影印嘉慶20年重刊宋本），卷7，頁1上。

書·張執傳》便云：「狐死首丘，心不忘本。」<sup>38</sup> 離鄉者或許受客觀限制，無法返鄉定居安葬，則透過某種動作，依舊可表達出重鄉重家，不忘其本的傳統觀念。如明人呂麓（嘉靖 41 年，1562 年進士）在〈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便說：「茲集出，天下曉然知元公之濂溪在春陵，而其寓廬山不能歸，亦以濂溪名堂者，正丘首之意也。」<sup>39</sup> 朱子對周敦頤以「不忘其本」譽之，當亦是在這種思維下的推測。甚至，還可能出自於自身移情作用的表現。朱子在其〈名堂室記〉中說明紫陽之號也是取自於對父親朱松不忘其本的思念：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sup>40</sup>

朱松（1097-1143）故鄉在徽州婺源，求學時曾遊覽徽州紫陽山，樂之而難忘。後來輾轉到閩中，刻紫陽書堂印章，懷念故鄉的紫陽山，藉此傳達他有志於返鄉的情感。然朱松終未能如願，臨終前雖遺命朱子依附好友劉子羽，居於福建武夷山下的五夫鎮，但朱子亦以未能達成父親返鄉之志而感到遺憾，遂依父親之例，將所居之樓命名為紫陽書堂。除表達對父親的思念外，亦具有《禮記》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的意涵，而這正與對周敦頤取名用意的判斷不謀而合。

朱子在〈遷墓記〉中記載父親朱松因貧以致未能將祖父歸葬故里：「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sup>41</sup> 承事公即朱子祖父朱森。徽宗政和八年（1118），朱松出任建州政和縣尉，朱森隨之遷入，尋即病故。然朱松並未將其遺體遷回婺源兆域，而是直

<sup>38</sup> 唐·房喬等撰：《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6冊，卷86，頁11上。

<sup>39</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7，頁293。

<sup>40</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78，頁3889。

<sup>41</sup> 同前註，卷94，頁4567。



接葬在政和縣護國寺側。朱松為何未將父親棺柩遷回祖籍婺源？朱子解釋為貧不能歸，明戴銑《朱子實紀》則載：「丁外艱時，方臘亂睦道梗，且貧不能歸，遂葬其親于政和護國寺之側。」<sup>42</sup>照戴銑的說法，很明顯是由於戰禍之故。但戴銑把朱森卒年記載為宣和末，方臘之亂早已平定於宣和三年，不可能在宣和末年會因為這個原因而無法返鄉。王懋竑則說：「宣和末，考吏部韋齋公松，字喬年，為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sup>43</sup>王懋竑取消方臘作亂道阻說，大概便是注意到這個問題。宣和乃徽宗年號，共計七年，因為《朱子年譜》記為宣和末，一般皆認為朱森卒年就是宣和七年，但束景南卻認為應當以宣和二年為是，其論證較為可信。<sup>44</sup>若朱森卒於宣和二年，當時確實正值方臘之亂，東南各州震動，徽州婺源首當其衝，此時未能歸葬回故里，實屬不得已。那麼朱子以貧不能歸解釋，未必就是真貧，而是一種無法實現返鄉安葬的藉口。朱子小時因隨父寓居的關係，並未在婺源生活。他曾在淳熙三年（1176）春，四十七歲時回婺源掃墓。〈名堂室記〉寫自居潭溪至今三十年，而朱子十五歲居潭溪，三十年後便大約是這個時間點寫下紀念父親的〈名堂室記〉。三年後，朱子知南康軍，立濂溪祠於學宮，並寫下〈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確認周子不忘其本。可見在這段時間內，朱子方經歷對自己父親故里思鄉情緒的省察，可能也是導致他接受取名

<sup>42</sup> 明·戴銑：《朱子實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正德8年鮑雄刻本），第550冊，卷2，頁1上。

<sup>43</sup> 清·王懋竑：《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

<sup>44</sup> 束景南說：「朱松任政和縣尉在政和八年至宣和二年年間，宣和五年調任尤溪縣尉，羅從彥〈韋齋記〉云：『宣和五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另見曹偉〈韋齋銘〉、石塹〈韋齋記跋〉。是朱松除尤溪縣尉在宣和五年八月，朱森絕不可能卒於宣和七年。朱熹〈朱松行狀〉云：『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虞集〈朱氏家廟復田記〉亦云：『政和戊戌以上舍出身，調建州政和尉，丁艱。服除，調劍之尤溪。』朱松除尤溪縣尉在宣和五年，上推三年，朱森當卒在宣和二年。」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6。

故里，以示不忘其本說的內在心理原因。

對周敦頤未遷回道州故里的推測，無論是朱子「不忘其本」，度正「貧不能歸」、「不忘父母之邦」的原因，乃出自於傳統觀念或個人主觀心理的影響。甚至度正在周敦頤四十五歲時有記云：「是歲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sup>45</sup>度正為何可以認定周子此時便有卜居之志，除是依據周敦頤後來行事的歸納外，對卜居異地的認定，可能也是受朱子影響。元虞集（1272-1384）《道園學古錄》有云：

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sup>46</sup>

虞集所引朱松之言，應是可信的。因為，根據朱子所撰〈遷居告家廟文〉，亦如此表明：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sup>47</sup>

朱松曾欲卜居建州考亭，那麼他便是既有懷鄉之志，卻又要卜居他處。朱子雖未明言將父親與周敦頤互相參照，但朱松這種矛盾行為與周敦頤的行事確實也頗為類似，因此以朱松的經歷去類推周敦頤的心理，這也是朱子合理的選擇。可以推測，正是這種心理因素及情感經歷，讓他在聽說濂溪乃取名故里的傳聞後，大致上就直接採信，並且用不忘其本來解釋周敦頤的動機。度正作為弟子，受朱子指導，自然也就有著相同的推斷。

周敦頤不忘本之說經朱子宣揚後，也成為後世文人未能返鄉定居時安慰自己的說法。如王義山（1214-1287）〈稼村自墓誌銘〉即載：「余辛巳歲卜居

<sup>45</sup>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頁 105。

<sup>46</sup>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7 冊，卷 36，頁 25 上。

<sup>47</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 86，頁 4273。

東湖，或曰：子棄鄉井，何居？余應之曰：濂溪家春陵而居湓浦，康節衛人，溫公陝人，皆居於洛。洪，吾父母國，庸何傷？」<sup>48</sup> 王義山曾刻意倣周敦頤愛蓮之意，其〈君子堂記〉云：「予居湖濱，愛蓮也。書濂溪〈愛蓮說〉于壁。」<sup>49</sup> 他並建有宗濂書堂，相當崇拜周敦頤。於是他在致仕之後，卜居歸隱洪州東湖，便以周敦頤家春陵而居湓浦為自贖藉口。另外，在查慎行（1650-1727）〈經周濂溪先生廢祠〉詩中，亦可見出不忘其本說的影響，其詩云：

尼山大聖人，重去父母邦，人情非得已，孰肯違故常。先生少而孤，依舅居丹陽。母歿即葬此，後乃官南康。官貧久不歸，遷柩於九江。仁心重廬墓，卜築匡山傍。托名寓濂溪，中豈忘故鄉。同時往還輩，無若蘇與黃。猶不諒此意，作詩徒誇揚。<sup>50</sup>

周敦頤離鄉而寓居廬山的行為，也是後世儒者心中不敢直言的疑慮。張栻、朱子以不忘其本解釋作為開端，度正添加貧不能歸，查慎行則總結成有難為人道的苦衷，一如孔子也是不得已離開父母之邦。於是這類未能回歸故里，歸根落葉的原因，便多以經濟貧困之限制為藉口，並效法周敦頤將故里濂溪之名寄寓在新居之上。透過這種志鄉關於目、不忘本的作法，以實現自我彌補的懺悔心理。

## （二）以濂溪為中心的傳說發展

由於周敦頤遷居廬山濂溪，於是此處便引發文人探訪尋幽的雅緻。陳舜俞（1026-1076）在《廬山記》中便曾記其訪遊途徑：「由江州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院，舊名羅漢壇，過延壽院五里，至石塘橋有濂溪，周郎中之隱

<sup>48</sup> 元·王義山：《稼村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3冊，卷29，頁18上-18下。

<sup>49</sup> 同前註，卷7，頁4上。

<sup>50</sup>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6冊，卷15，頁1下-2上。

居。」<sup>51</sup>將九江濂溪的遊歷路徑說得相當清楚。又如度正撰〈留題九江濂溪書堂〉云：「維暮之春萬象都，望花尋柳過溪居」，<sup>52</sup>便是尋得濂溪書堂後所寫之題詩。另外如林煥有〈題濂溪〉云：「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魏了翁亦有詩云：「四海蓮華峰，濂溪漲清芬。擬求一勺水，浣我三斗塵」，<sup>53</sup>都是因慕濂溪之名而來尋訪。

自濂溪取號故里說被朱子確認後，道州之濂溪亦開始受到關注。以周敦頤為題的傳記文章多會優先澄清其故里問題，如朱子在〈周敦頤事狀〉中開篇便說：「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sup>54</sup>特別註明濂溪在營道。何子舉〈先生墓室記〉也於開篇便說：「先生世家春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潞，蓋襲春陵舊耳。」<sup>55</sup>亦同朱子強調濂溪是襲故里舊名。度正《年譜》中甚至多次刻意註明周敦頤出於道州濂溪，如開篇便先說：「先生生於道州營道縣之營樂里濂溪保。」<sup>56</sup>表現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又《年譜》於仁宗天聖七年己巳條下說：「里有濂溪，濂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sup>57</sup>天聖九年辛未條下亦記云：「先生偕母僊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sup>58</sup>幾乎是不厭其煩地一再強調周子是營道濂溪人。受此影響，元明以後學者依舊會提起這個問題，如《宋史·道學傳》也承朱子之說，指周敦頤「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sup>59</sup>明人魯承恩〈濂溪志序〉說：「濂溪在道州西南三十里，

<sup>51</sup> 宋·陳舜俞：《廬山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5冊，卷2，頁1上。

<sup>52</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23下。

<sup>53</sup> 同前註，頁29上。

<sup>54</sup> 同前註，卷8，頁15上。

<sup>55</sup> 同前註，頁18下。

<sup>56</sup>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頁99。

<sup>57</sup> 同前註，頁100-101。

<sup>58</sup> 同前註，頁101。

<sup>59</sup> 元·脫脫：《宋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影印元至正刊本），第43冊，卷427，頁3下。

昔為營道縣，今為濂溪保，宋道國周元公先生實生其地，故世皆稱曰濂溪先生。」<sup>60</sup> 鄧顯鶴《沅湘耆舊集》亦云：「因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志鄉關常在目中。」<sup>61</sup> 這些文獻都不約而同地刻意強調周敦頤來自道州濂溪。另外，自南宋推尊周敦頤後，各地以濂溪名號所建立的書院、祠堂，多不勝數，學術界亦編纂以濂溪為主題的志書，收錄論斷及褒崇周敦頤的相關文獻，甚至紀其宗族繁衍，後裔優卹等資料，有助於學者對周敦頤的全面研究。自明代以下，現存之《濂溪志》即有八種，其中多有文人實地走訪道州濂溪的記錄，也連帶興起對周敦頤故里的附會傳說。

道州營道位處三湘九疑之野，地雖偏遠，然文人亦像訪尋廬山一般，充滿探訪興趣。早在南宋時，張栻便曾因地近之便，有訪求濂溪故跡之意。魏了翁〈道州建濂溪書院記〉也記其訪道州濂溪的經過：「一日，出郭西三里，斂虞帝廟。事畢，遊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石林立，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經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夫作地藏而有待焉者。」<sup>62</sup> 不只有濂水，連濂山也出現了。又如明人崔惟植也說：「植權視州篆，得造公故里，遡濂溪，躋月巖，想像其光霽。」<sup>63</sup> 清儒吳大澂在〈刻濂溪先生志序〉亦記他承乏道州時的欣喜之情：「向者徒勤夢想，而今乃仕先生里耶，當必有真知灼見以大慰乎寤寐之所求者，不僅如客之云云也。」<sup>64</sup> 儒者若被派官至湖南或其周邊，產生探訪周子故里的想法，本不足為怪，但卻由此造就出對地理環境附會的許多傳說。以濂溪為例，黃庭堅詩曾說：「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sup>65</sup> 賀鑄詩則說：「濂溪之水清，未足濯公纓」，<sup>66</sup> 朱子〈濂溪先生事實記〉亦云：「先

<sup>60</sup>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卷7，頁275。

<sup>61</sup>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19，頁1下。

<sup>62</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9，頁367。

<sup>63</sup> 同前註，卷7，頁293。

<sup>64</sup> 同前註，頁302。

<sup>65</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15下。

<sup>66</sup> 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3冊，卷4，頁11上。

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sup>67</sup> 這些詩文所說的都是九江之濂溪，濯纓也只是對其品格高潔的稱頌語。度正《年譜》則提到道州故里濂溪上有橋有亭，周子常於此釣游，吟弄風月，明顯出於想像，但學者仍樂於稱道，趙櫛夫〈濂溪大富橋記〉也述及這段傳聞：「未至故居，二百餘步，有水縈紆，隱隱如青羅帶者，濂溪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橫跨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舊傳元公年十三時，釣遊之所，其然，豈其然耶！」<sup>68</sup> 然元明之後，周敦頤幼時在道州故里釣游濂溪的傳聞，漸與在九江濯纓濂溪之事融合，變成周敦頤小時就在道州濂溪濯纓，如明儒胡直〈金陵三勝紀略序〉便云：「予擊二三子從湘源謁濂溪，窺月巖。濂溪去州舍許，去元公廬不里許，泉汨汨從石出。相傳元公濯纓其下。」<sup>69</sup> 朱子分明說周敦頤濯纓於九江之濂溪，這時卻已變成道州之濂溪。又如明人廖道南〈邵州周元公祠銘〉說：「自周元公，產自舂陵，月巖鳴鐸，濂溪濯纓。」<sup>70</sup> 這也是指道州濂溪。甚者，濂溪更被學者形容成蘊含天地靈氣的神秘水流，明人戚昂〈題濂溪〉則云：「一派濂溪日夜流，滔滔東逝幾時休。須知此水同天地，天地窮時是盡頭」，<sup>71</sup> 這種出於崇敬的附會之說，讓濂溪深植文人心中，成為能夠匯聚靈氣，產生理學賢聖的神聖溪流。

這種心態的擴大，便產生對周子故里的益加附會。《徐霞客遊記》也曾自述探尋過道州濂溪故里。他以濂溪祠為中心，將地理形勢描寫得相當詳盡：

祠北向，左為龍山，右為豸山，皆後山象形，從祠後小山，分支而環突於前者也。其龍山即前轉嘴而出者，豸山則月巖之道所由渡濂溪者也。祠環於山間而不臨水，其前擴然可容萬馬，乃元公所生之地。今止一、二後人守其間，而旁無人焉。無從索炊，乃西行一里過豸山，沿其北，

<sup>67</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 78，頁 3910。

<sup>68</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 7，頁 255。

<sup>69</sup> 明·胡直：《衡廬精舍藏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7 冊，卷 9，頁 41。

<sup>70</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 11，頁 528。

<sup>71</sup> 同前註，頁 554。

又一里，渡濂溪。溪自月巖來，至此為豸山東障，乃北走。又東至州西入迤水。<sup>72</sup>

據其考察，濂溪祠後的左右兩方各有龍山、豸山，濂溪溪水則從月岩而來，繞過豸山東邊，最後北流東轉再入迤水。徐弘祖的遊訪雖極其詳細，但據其所言，此處已幾乎無人居住，因此他所探訪位置的確切性，難以證明。然從他所舉的地點來看，除濂溪外，尚有龍山、豸山、月巖等山嶺，這些地點也被附會成是周敦頤道學養成的重要契機處。

在文人的持續探索下，營道故里便被附加以許多地理上的傳聞。如周子恭〈游濂溪故里記〉便把周子故里說成幾乎是精心規劃的遊遊景點：「七泉子游濂溪故里，自月巖而下，至於安心寨，歷聖脉泉、風月亭、濯纓亭。月巖，得濂溪悟太極之因；聖脉泉，得山下出泉靜而清之旨；風月亭，得光風霽月之趣；濯纓亭，得濂溪濯纓之處。」<sup>73</sup> 這樣的故里，已然是天地精華、人文彙萃之處。以月巖為例，相傳乃周敦頤契道太極之處，度正說：「濂溪之西十里，有巖洞，高敞虛明，東西兩門，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圓若月望，俗呼月巖。先生好遊其間，相傳睹此而悟『太極』，想當然耳。」<sup>74</sup> 度正籠統的用想當然耳帶過，但他將此條繫於周子十三歲時，便不合常理。然而後世學者依舊深信周子就是在此處領悟太極，明人蔣忠〈月巖〉詩云：「一竅通天月出初，陰陽動靜兩模糊。元公契得於中理，寫作先天太極圖」，<sup>75</sup> 清王遵度〈月巖並序〉亦說：

<sup>72</sup> 明·徐弘祖著：《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2下，頁221-222。

<sup>73</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7，頁257。又據清人彭開勛《南楚詩紀》所載，這些地點均與周敦頤有關。其云：「安定山，在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岩，土人築以避寇，曰安心岩。周敦頤故宅在其麓。山西石壁鑄道山二大字，山下有石竇出泉，即濂溪也，人呼為聖脈泉。泉之上為有本亭，迤東為風月亭。沿溪而東，為濯纓亭。又東，為家廟。愛蓮池，在州學西，濂溪書院北。」見清·彭開勛：《南楚詩紀》（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與《楚南史贅》合刊本），頁82。

<sup>74</sup>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頁101。

<sup>75</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11，頁555。

月巖，濂溪先生學道處也。山西面起，上接天光，團圓肖月，體由東而上，歷一磴，窺月一彎。所歷更多，所窺漸滿。西下月魄漸掩，視所下之磴，天實生此靈境，以啟斯人矣。<sup>76</sup>

彷彿親臨其境，說得活靈活現。除月巖外，周子故里尚被開發出五星墩一地，以呼應宋太祖時五星奎聚之傳說。趙匡胤在位時，五星曾聚於奎宿，遂被視為開創大宋的祥瑞。其後朱子便將由宋太祖開創文治到周敦頤理學興起，連結成為天命歸屬的表現。他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中云：「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sup>77</sup> 五星聚奎，開創文明氣運，並延續到周敦頤等北宋五子之身。為符應朱子所言，學者遂找到周敦頤故里的土丘，將其視之為本於山水馨香的天啟根據地。如明人呂麓〈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便云：

天開宋文治，故奎聚五星於時，周元公生於舂陵，其地亦有五星墩焉。蓋天地協祥以篤生真儒，宜乎其上也孔孟千載如線之緒，以開群迷於無窮也。<sup>78</sup>

本為故里不起眼的地勢形貌，竟與五星聚奎連結，由天象轉化成五星墩地景，因而成為開創大宋文明及儒學復興的重要啟示。

若將種種故里地景的傳說綜合串連起來，則可如明人李嶠慈〈濂溪周元公志序〉所說：「先生鍾蒼龍、白豸之靈，篤生於有宋天禧間，契道月巖，濯纓濂水，得河洛不傳之祕。」<sup>79</sup> 亦如明人方瓊〈濂溪遺芳集序〉云：「誠以營道一山，天啟周子以悟道之機；月岩一像，天啟周子以太極之理，濂溪一派，天啟周子以斯道之源。」<sup>80</sup> 再如明崔惟植〈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之語：

<sup>76</sup> 同前註，頁 587。

<sup>77</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 78，頁 3899-3900。

<sup>78</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 7，頁 292。

<sup>79</sup> 同前註，頁 283。

<sup>80</sup> 同前註，頁 279。



公崛起春陵，月巖垂竅宛然無文之圖。先天秘奧，天實眎之於時，五星既麗於天，復化生五墩，繞宅里，以應五星之象。是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元公實應期而生，是為至人，三才相待以有成其理，信不誣也。<sup>81</sup> 這些被賦加上層層意涵的地理景緻傳說，自然都是後人尊崇周敦頤的表現。但朱子等人對濂溪故里之名的肯定，亦是這些傳說形成的重要推手。由對濂溪的探訪，發展出對其周邊地勢景點的傳說，這也可謂濂溪取名爭議意外帶出的文化影響。

#### 四、自製取名說的過程與爭議

在朱子大力推崇周敦頤之前，北宋文人間即流傳有歌詠濂溪的文章詩歌，主要是受到周敦頤兩個兒子周壽及周燾為其父親延譽所作。如黃庭堅〈濂溪詞并序〉云：「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sup>82</sup> 蘇軾亦有〈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次元乃周敦頤次子周燾，也是他向東坡求詩而得。此外，賀鑄〈寄題潯陽周氏濂溪草堂〉序文亦說：「丙子五月，余棹舟漢陽，始與元翁相際，求予賦此詩。」<sup>83</sup> 丙子乃哲宗紹聖三年（1096），賀鑄則是因為與周壽相遇相知，受其求詩而作。因此，蘇、黃等人之所以得知周敦頤，應該受自周壽兄弟的介紹，故有必要就二子求詩過程及其目的作一番考索。

##### （一）二子求詩的問題探考

周壽、周燾二人在當時的名氣可能不亞於其父，他們與名士蘇軾、黃庭堅等人從遊甚密，多有唱和之作。尤其黃庭堅對周壽相當推崇，〈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曾說：

<sup>81</sup> 同前註，頁 293。

<sup>82</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 8 冊，卷 7，頁 15 下。

<sup>83</sup> 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 4，頁 11 上。

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為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遂洊登。茲茂叔有子！<sup>84</sup>

黃氏謂周壽志節純粹不朽，可與日月爭光，又說早年便發覺他是個穩重的青年，進而讚嘆茂叔有子。周壽這時的年紀應該不小，黃庭堅卻從能繼承父親的角度稱揚周壽，可見周壽相當在意對父親的評價。甚至黃庭堅稱讚周敦頤「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語，亦可能就是受周壽在他心中的形象所影響，才能用類似的話語形容周敦頤。

關於周壽、周燾二人之記錄，史料記載不多。史容《山谷外集注》說：

周敦頤濂溪二子：壽、燾。壽字季老，後改元翁。燾字通老，後改次元。……元豐五年於黃裳榜登第。……後次元亦于元祐三年李侍寧榜登第。元翁終司封員外郎，次元終徽猷閣待制。<sup>85</sup>

僅簡略記載二人字號、登第之年以及最後仕宦官職。又根據《周敦頤年譜》所載，周壽於嘉祐二年（1057）生於合州，周燾則在嘉祐七年（1062）時生於虔州，卒年均不詳。蘇軾、黃庭堅長二人約十餘歲，故周壽兄弟是以後輩身份向蘇、黃求詩。且二人求詩以顯父親美德的行為，並非單純某時思親而興起的動作。從黃庭堅始，中歷蘇軾，後則有賀鑄，前後至少十餘年。且可能尚有其他求詩作品，如宋僧釋道潛（1043-1106）亦曾與周壽交游，他也有〈周茂叔郎中濂溪〉詩，應該也是周壽請求而作。

周壽兄弟為父親求詩最早應該開始於黃庭堅的〈濂溪詞〉。但關於黃庭堅〈濂溪詞〉的寫作時間，則有兩種不同說法。黃子耕《山谷先生年譜》以為作於崇寧元年（1102），如此則是黃庭堅晚年作品，但史季溫說：「元豐間，山

<sup>84</sup> 宋·黃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卷30，頁12上。

<sup>85</sup> 宋·黃庭堅撰，史容注：《山谷外集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卷9，頁23下-24上。

谷知太和縣，壽為吉州司法，因同官而遊從甚熟，是詩必太和所作，故有潛德之語云。」<sup>86</sup> 則以為當作於早年任太和縣令時。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亦以黃庭堅在神宗元豐三年調赴太和，四年春抵達，故〈濂溪詞〉應作於元豐四年（1081）。鄭永曉又說：「集中此前亦無與周氏兄弟唱和之詩，故可斷定，山谷與周氏相交必在到達太和以後。」<sup>87</sup> 據前引黃庭堅〈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說少時在廬陵曾與周壽同僚，廬陵位於吉州，近太和縣。周壽既為吉州司法，因地近之便，當是於此時相識。不過，史容說詩必作於太和之間的原因是因為有潛德之語，這是因為〈濂溪詞并序〉中有提到：「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予作濂溪詩，思詠潛德。」<sup>88</sup> 據史容的意思，應是以潛德指周壽。周壽當時年紀應在二十五歲上下，他在未登第前曾蔭補太廟齋郎，此時蓋調吉州司法參軍事。黃庭堅有〈奉送周元翁鎖吉州司法廳赴禮部試〉一詩，即是元豐四年時送周壽赴禮部考試時所贈，次年即登春官。那麼據史容的說法，黃庭堅之所以作〈濂溪詞〉，亦有褒揚周壽潛德之用意。但觀序文接著頌揚「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生平之志終在丘壑。」<sup>89</sup> 則潛德者仍應為周敦頤，乃指其具不為人知之美德，未必是指周壽登第之前有潛龍之德，故史容的說法應予修正。

除黃庭堅外，蘇軾亦曾與周燾唱和，並以〈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歌詠濂溪，《東坡詩集》並自注「谿在廬山下」。<sup>90</sup> 關於此詩寫作時間，南宋施元之注云：「周茂叔先生子燾，字次元。公守杭，次元為兩浙轉運，同在錢塘，為賦此詩。」<sup>91</sup> 東坡曾兩度守杭，一在熙寧四年（1071），三十六歲時。

<sup>86</sup> 宋·黃庭堅著，史季溫注：《山谷別集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卷上，頁3下。

<sup>87</sup>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頁114。

<sup>88</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15上。

<sup>89</sup> 同前註。

<sup>90</sup> 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7冊，卷18，頁9上。

<sup>91</sup> 宋·蘇軾撰，施元之注：《施注蘇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0冊，卷28，頁19上。

周燾時僅十歲，故不可能寫於此時。第二次守杭則在元祐四年（1089），這時周燾剛登進士，年二十八歲。若據施注，則是被派為兩浙轉運。清儒李紱曾批評取名故里說，便以為周燾當時官職在東坡之上，不可能任東坡誤解父親濂溪用字，他說：

東坡作詩，在守杭時，周子次子燾，字次元者，方為兩浙轉運，同在錢塘，東坡其屬吏，又交好也。所為詩果失本旨，何難指示，令其改正。<sup>92</sup>

東坡詩並未用濂字，而是去水旁的廉，李紱認為若東坡錯用，位階高於東坡的周燾，大可直接指正。不過李紱應該把周燾的兩浙轉運當成是轉運使，若為兩浙轉運使，位階自然在杭州知州之上，但豈可能周燾才剛登第，隔年就能被派任為地方最大的路轉運使，甚不合理。孔凡禮《蘇軾年譜》註明周燾此時為兩浙轉運判官，<sup>93</sup>轉運判官位階尚在副使之下，為從六品。蘇軾任知州則為五品官，且東坡是由京官兼地方官，乃龍圖閣學士除知杭州，身份榮顯。周燾則初入仕途，位階自然尚在東坡之下，所以不會有李紱妄自推測可因官階而予以指正的情況。

周壽約在元豐四年請黃庭堅寫詩，周燾於元祐四年請蘇軾寫詩，間隔八年。再七年後，賀鑄又受周壽相求而寫詩詠周敦頤。如此看來，周壽兄弟自成人後，始終不忘宣揚父親美德。這十五年間，與當代文豪一旦結識，即以父親名號邀詩，寫下數篇與濂溪有關的詩詞，自然會論及父親取名之意，並間接達成遠播濂溪之名的效果。另可注意的是，濂溪之號似為長子周壽所沿用。《山谷老人刀筆》錄有黃庭堅〈答濂溪居士〉<sup>94</sup>一書，然黃庭堅與周敦頤並未直接往來過。觀此書口吻，似與同輩對答，那麼這位濂溪居士應該是周壽。釋道潛〈規師方外停雲齋〉詩云：「銘詩善摹寫，居士亦風流。」其下有注云：「揭

<sup>92</sup> 清·李紱：《穆堂別稿》，卷50，頁22下。

<sup>93</sup> 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886。

<sup>94</sup> 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元刻本），第26冊，卷15，頁2下。

榜作銘皆濂溪居士，居士即周元翁也。」<sup>95</sup>可見周壽後來亦以濂溪居士自稱。此濂溪居士既非周敦頤，便可解決後人據此文而發生的一段誤解。黃庭堅〈答濂溪居士〉中有段文字說：「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文老。」<sup>96</sup>黃庭堅希望周壽能到廬山歸宗寺去拜訪文老，文老為真淨克文禪師。但明清學者卻多以為這是黃庭堅誤導周敦頤入佛的舉動。明人王禕（1321-1372）便說：

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sup>97</sup>

元豐年間周敦頤已不在世，如何可能與真淨克文禪師交游。王禕竟還能說周敦頤數至歸宗寺，分明搞錯對象。又如清人方文亦說：

元豐間，真淨文老住歸宗。是時濂溪先生亦解官，居廬山。黃山谷以書勸先生與之遊，故先生數至歸宗，與文老談，甚洽。<sup>98</sup>

方文沿襲同樣的錯誤，把黃庭堅致信對象誤認為周敦頤。根據《五燈會元》所記，真淨克文圓寂於崇寧元年（1102）十月時，他並且自謂：「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sup>99</sup>紹聖三年是1096年，距周敦頤逝世已有二十餘年，此時真淨克文禪師始入住廬山歸宗寺，也才符合黃庭堅要周壽去拜訪的時間點。

周敦頤隱居廬山時，周壽兄弟正值少年，加上父親又在此離世，九江濂溪故居對他們而言亦必有深刻情感。又從前引賀鑄詩序來看，紹聖三年五月始與周壽相際，七月別離，十月後則有〈懷寄周元翁十首〉。其中第一首說：「自

<sup>95</sup> 宋·釋道潛：《參寥子詩集》，《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宋刊本），第29冊，卷7，頁9下。

<sup>96</sup> 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卷15，頁3上。

<sup>97</sup> 明·王禕：《王忠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6冊，卷9，頁4上。

<sup>98</sup> 清·方文：《蠡山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康熙28年王槩刻本），第1400冊，卷之2，頁7上。

<sup>99</sup> 宋·釋普濟撰：《五燈會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3冊，卷17，頁61上。

君居湓城，況況一夢餘」，<sup>100</sup> 第五首則說：「周郎歸濂溪」，<sup>101</sup> 則周壽後來又返湓城濂溪居住，當是把濂溪視為故鄉。濂溪之名不只寄託對父親的孝思，更希望能在名義上開拓意涵，以宣揚父德。即使道州另有故里濂溪，亦未必會是二人知曉或關注之事。

## （二）蘇、黃等詩作中的濂溪意涵

黃庭堅在〈濂溪詩序〉中曾表明這是周敦頤用平生所安樂之濂字，媿水而成，賀鑄也說濂溪用以自況，在他們的認知中，廉節就是周敦頤的人格特質，亦即周壽兄弟所傳達父親品德的訊息。是以黃庭堅〈濂溪詞〉便著重將廉德融入刻畫周敦頤隱居濂溪上的生活，其云：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sup>102</sup>

詩詞想像周敦頤樂遊濂溪，逍遙自適的生活樣貌，飯羹濯纓、絃琴觴酒，寫溪聲、聽潺湲，都是文人理想中安於貧困的隱退生活。透過這樣的描述，烘托周子高潔人格，並強調其廉節品德對於沈溺世俗名利者的激勵作用。

東坡之詩則從議論而發，並提及溪名的來源，其〈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第三聯起云：

坐念此溪名，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之知，以為溪之名。  
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sup>103</sup>

東坡雖指廉退乃周子全德之一隅，但詩中寫「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仍是對周子廉德美化的稱揚。雖有學者認為依「柳州柳」、「愚溪愚」的筆法，則

<sup>100</sup> 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4，頁14下。

<sup>101</sup> 同前註，頁15上。

<sup>102</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15下-16上。

<sup>103</sup> 同前註，頁14上。

溪名該作廉溪，無水部偏旁。不過文人寫詩，不能粗淺的就字面解讀，且這種推測明顯與黃庭堅說法有異，只能說蘇軾主取偏旁廉字來取意，這應該也符合周燾的請求。

至於賀鑄〈寄題潯陽周氏濂溪草堂〉則如黃庭堅以濂溪為名，其詩云：

濂溪之水清，未足濯公纓。平生抱苦節，成就此溪名。  
長笑置符傳，孤雲歸思輕。溪頭四壁居，溪下百畝耕。  
量汲奉晨盥，課樵共夕烹。希逢杖屨遊，但聽弦歌聲。<sup>104</sup>

由於賀鑄在詩前序文有提到周敦頤退居潯城之後，名濂溪以自況，所以他所設想的情境也是周子歸隱於濂溪之上，一面躬耕課樵，一面絃歌讀經，過著與世無爭，閒適和樂的生活，也是寫廉節者不以榮利為樂的高潔志向。

上引三詩主在歌詠周敦頤淡泊隱退，樂於田園生活，並將濂溪與廉退之德連結。由這些詩歌來看，周燾兄弟對濂溪所蘊涵廉節之德的宣傳，確實產生效果。尤其以廉取義的說法，應可視為是二人對父親取名濂溪用意的認識。

### （三）周敦頤友人對濂溪之歌詠

除蘇、黃等著名詩人外，周敦頤在世時的友人，亦曾多次歌詠濂溪。研究者多主張這些友人詩中無一提到故里濂溪，因而贊同自製取名說；<sup>105</sup> 然度正也曾根據友人趙抃之詩，證明故里有濂溪。因此，周子友人詩歌中的訊息，也是必須進一步考察的對象。首先，周敦頤友人潘興嗣在為其所撰之墓誌銘中，提到兩人相約退隱後共游濂溪之上：「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

<sup>104</sup> 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4，頁11上-11下。

<sup>105</sup> 如孔煜華說：「各種版本的周敦頤集中均不見周氏本人對故號濂溪的任何記載……不僅如此，在周敦頤與友人的唱和中也找不到道州濂溪的踪跡。」孔煜華：〈濂溪辨〉，頁20。又吳懌說：「周敦頤的友人應該是知情的。他的友人如趙抃、李大臨、任大中、潘興嗣等都是堅持正義的廉吏，而周敦頤一生廉潔，為人正直，故任大中有〈濂溪隱齋〉詩……揭示了周敦頤以『廉』命名溪水，寄託其廉潔無私思想，……而不可能是『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之意。」吳懌：〈周敦頤「濂溪」之名考辨〉，頁9。

曰濂溪書堂。每從容謂予言：『……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sup>106</sup> 據此，潘興嗣曾親訪濂溪，他的〈題濂溪〉就對濂溪景緻進行描寫：「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澗澗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戶牖。峩峩雙劍峯，隱隱插牛斗。踈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sup>107</sup> 將濂溪水山景色寫得頗為生動。他並用道家精神表現周敦頤的情懷：「窅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斲鼻固未免，安能混真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願言與君壽。」<sup>108</sup> 此詩著重於從道家式的歸隱心境來表現周子樂愛山林之趣。潘興嗣另有〈和茂叔憶濂溪〉，詩云：

憶濂溪，高鴻冥冥遯者肥，玉流來遠不知源，源重巖翠深遮圍。試將一酌當美酒，似有冷然仙馭飛。素琴携來謾橫膝，無絃之樂音至微。胡為劍佩光陸離，低心俛首隨轉機。伊尹不忘畎畝樂，寧非斯人之與歸。<sup>109</sup>

詩歌可提供的訊息同樣仍在對濂溪美景的描述，雖多了分仙氣，依舊是幻想著能在歸居濂溪之上，享受安樂的生活。這其敘述來看，潘興嗣所看重的還是周子廉退之德。

度正將周敦頤廬山購田的時間點判定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友人題詩大致也都在這個時間點後，如英宗治平二年，周敦頤四十九歲，妻舅蒲宗孟（1022-1088）便曾寄詩周敦頤，其中有云：「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啼。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濂溪。」<sup>110</sup> 此年周敦頤赴永州，雖在故鄉道州附近，但蒲宗孟卻安慰周敦頤在永州的日子應與在濂溪時相似，則此濂溪並不指道州。但他是妻舅，不是宗親，未必知道周敦頤故鄉情況。另又有詩說：「山水平生好，嘗來說退居。無家歸

<sup>106</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8，頁10上-10下。

<sup>107</sup> 同前註，卷7，頁4下-5上。

<sup>108</sup> 同前註，頁5上。

<sup>109</sup> 同前註，頁5下。

<sup>110</sup> 同前註，頁9下。



絨冕，有子侍籃輿。湓浦方營業，濂溪遊結廬。零陵官俸剩，應得更添書。」<sup>111</sup>他於此詩下並且自注：「茂叔濂溪有書堂。」可見湓浦的濂溪，就是周敦頤曾與蒲宗孟論及要退居後的歸宿之處，因此，蒲宗孟並未將濂溪視為周子故里。

趙抃曾為周敦頤長官，兩人相互推重，他有〈題茂叔濂溪書堂〉，開篇便說：「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sup>112</sup>明顯指廬山之濂溪。但趙抃另有一首〈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卻變成問題的爭議點，此詩云：

君去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鄉程；九疑南內參空碧，二水秋臨徹底清。詩筆不閑真吏隱，訟庭無事洽民情；霜鴻已到衡陽轉，遠緒憑誰數寄聲。<sup>113</sup>

趙抃為安慰周敦頤被調永州的失落，特地以湖南地景入詩，意在勾起鄉情。九疑即九疑山，位處今湖南寧遠縣，屬永州治內；二水蓋指湘水、瀟水，匯流於永州市；衡陽則為衡州治所，同樣在今湖南境內。但是度正《年譜》卻將首句引作「君向濂溪湖外行」，甚至以此作為證明道州有濂溪的證據，他說：

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於濂溪云：「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先生以疏慰之。四月，趙清獻尹成都，聞先生移永，寄詩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濂溪也。<sup>114</sup>

度正將此條置於英宗治平二年下，時周敦頤四十九歲，從虔州調赴永州。道州在永州之南，永州縣治距道州道縣百餘公里，便於周敦頤回鄉探望，於是趙抃稱「倅藩仍喜便鄉程」，正謂赴永之路近於歸鄉，亦屬可喜之事。所謂湖外乃指洞庭湖南方，即今湖南，於北宋時為荆湖南路。唐人稱南方為外，如嶺南為

<sup>111</sup> 同前註，頁9下-10上。

<sup>112</sup> 同前註，頁7上。

<sup>113</sup> 同前註，頁8上。

<sup>114</sup>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頁108。

嶺外，宋人則指荊南為湖外。趙抃謂其湖外行，確實指往永州方向的對移而言。那麼若如度正所舉，向著濂溪作湖外行，則濂溪便會在道州，與九江廬山下的濂溪，勢必不同處，如此便可作為濂溪在周敦頤家鄉之證。但此詩文字有兩種版本，一即度正所引，在趙抃自己的《清獻集》中卻作「去」，<sup>115</sup> 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引此詩亦同作去。若作去，詩意便當解為離去濂溪，向著湖外而行，則與度正之說完全相反。周敦頤之所以會從虔州調赴永州，是因虔州發生火災意外，焚毀千餘家，因而受到牽連，移調永州。當時吳人程師孟知永州，曾寫信慰問：「永水自然勝瀨水，浯溪應不讓濂溪」，<sup>116</sup> 永水、浯溪皆永州境內水流名，程師孟將瀨水、濂溪與這兩條水流相對，則他並未認為濂溪屬道州。這樣看來，應該是度正錯用版本。

現存周敦頤友人所作詩歌提及濂溪最多次者，當為任大中。他有四首詩，或以濂溪為題，或於詩辭中寫出濂溪，意義各有不同。如〈濂溪隱齋〉詩云：「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sup>117</sup> 讚揚周子具廉節美德。又〈再題虞部周茂叔濂溪〉云：「公廉如古人，祿利千鍾疎。照髮一簪墨，樂歸溪上居。大溪深一丈，松筠自不枯。公心保如此，真為廉丈夫。廉名似溪流，萬古流不休。我重夷齊隱，日月光山丘。」<sup>118</sup> 稱周子為廉丈夫，並以溪流譬之，萬古不休，甚至將之比為伯夷、叔齊，還是在歌詠其廉節美德。任大中另兩首詩則涉及濂溪的位置。其〈江上懷永陵倅周茂叔虞部〉云：「監州永陵去，遠目立江干。煙浪三湘闊，風帆八月寒。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上，歸因作釣竿。」<sup>119</sup> 此詩應是周敦頤赴永時的送別之作，詩末提到要周敦頤先種竹於濂溪，待自永回歸之後，便可削竹作釣竿，真正享受歸隱之樂。另一首〈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則說：「君去何人最淚流，老

<sup>115</sup> 《清獻集》有四庫本以及明汪旦嘉靖四十一年刻本，皆作「君去濂溪湖外行」。

<sup>116</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附錄〉，頁7下。

<sup>117</sup> 同前註，頁11下。

<sup>118</sup> 同前註，頁12上。

<sup>119</sup> 同前註，頁12上-12下。

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及秋來鴈，直到瀟湘水盡頭。」<sup>120</sup>前詩是送周子赴永，此詩詩題則說送其歸居濂溪。周敦頤在永州待了三年，治平四年時離開，旋即又被派赴邵州，然據詩題來看，周敦頤應該是在這個空檔時期暫時還居廬山濂溪。

曾詠濂溪者，尚有前已引程師孟〈茂叔通判虞部赴零陵〉說：「移官遠過耒陽西，好景重重合盡題。永水自然勝瀨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曾是忠賢流落處，至今蘭正尚萋萋。」<sup>121</sup>零陵即永州，故從詩題來看，也是寫於周敦頤赴永前。然程師孟把永水、浯溪與瀨水、濂溪相對，分明就是用永州山水與江西山水作對比，甚至提出鄉人等候之情，雖然他意在安慰愛好山水的周敦頤，但明顯不以濂溪為其故里。另外張舜民（英宗治平二年進士 1064）有〈濂溪詩〉提到：「北人要識濂溪景，請問江州借地圖。」<sup>122</sup>再則王庶有〈濂溪詩〉提及：「歸來廬山邊，弛擔休征駕。尋幽經隱居，脩竹樊田舍。」<sup>123</sup>都表明濂溪就是江州廬山下的濂溪。作《廬山記》之陳舜俞也有〈濂溪〉詩云：「主人去微官，歸意常欲速。畫圖隨行李，林囿日在目。公卿為之賦，佳句滿瑤軸。年來請便郡，旦暮戒童僕。乘霜歸荒徑，趁雨添新斲。應恨公未歸，公貧猶待祿。」<sup>124</sup>雖指周敦頤早有歸隱濂溪的想法，但因貧而仕的困境使其難以如願。另外李大臨〈濂溪謁周虞部〉云：「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我亦忘機淡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sup>125</sup>周敦頤在神宗熙寧三年時轉虞部郎中，四年移知南康軍，便致仕歸隱於廬山下。李大臨詩題表明謁周虞部於濂溪，則應該就在他定居廬山後。如此看來，周敦頤

<sup>120</sup> 同前註，頁 12 下。

<sup>121</sup> 同前註，頁 7 下。

<sup>122</sup> 同前註，頁 16 下。

<sup>123</sup> 同前註，頁 17 上。

<sup>124</sup> 宋·陳舜俞：《都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6 冊，卷 12，頁 6 上。

<sup>125</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 8 冊，卷 7，頁 11 下。

自買下廬山田地後，便四處通知友朋，於濂溪建書堂，並有歸隱想法，所以諸友人才會紛紛以濂溪為題，或歌詠地景之美，或預賀榮休之情，或頌揚廉退之德。尤其倅永時，雖近故鄉，但畢竟有遭貶之感，於是友人亦頗以濂溪入詩，以待歸之意慰勉。周敦頤一直到五十六歲定居之後，尚有李大臨以濂溪為題寫詩。在古代通訊不便的限制下，可以肯定這是他自發向友朋傳達的訊息。但據這些詩歌看來，他是以廉節之德向友朋解釋濂溪命名之意，濂字的來源並不是論述重點，故從這些唱和詩文雖未見由故里取名的線索，但也沒有像黃庭堅那樣分析濂字新創的用意。

## 五、後人批評濂字取義之討論

雖然周壽兄弟所傳達訊息是以廉節解釋濂字，但自朱子及其友朋展開對濂溪故里說的推廣後，也連帶造成學者開始檢討周壽兄弟為何不能準確傳達父親意思的批評，甚至還產生這是周壽為避黃庭堅叔父之名而刻意作出的修改。林栗便記云：「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父之諱改焉。」<sup>126</sup>意思是說黃庭堅叔父名字中有廉字，周壽求詩時為免犯諱，故意把廉溪改成濂溪。《湖廣通志》甚至以為濂溪與廉溪不同：

今江西九江府濂溪周子詩云：「吾欲固易足，名廉朝暮箴」，又蘇軾詩云：

「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則九江自為廉溪，而營道乃濂溪也。」<sup>127</sup>

以道州故里為濂溪，九江新居則是廉溪，這是為彌縫命名爭議，根據並不充足。另外《山谷詩集》稱濂溪「短於取名，銳於求志，薄於傲福，厚於得民」，<sup>128</sup>然《宋史·道學傳》卻引作「廉於取名」，<sup>129</sup>應是為符應周子之廉德而修改。

<sup>126</sup> 同前註，卷 10，頁 2 上。

<sup>127</sup> 清·邁柱等監修：《湖廣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1 冊，卷 11，頁 67 上 -67 下。

<sup>128</sup> 宋·黃庭堅：《山谷集》，卷 1，頁 14 上。

<sup>129</sup> 元·脫脫：《宋史》，列傳卷第 186，頁 3 下。

然所謂的「取名」，當指求取聲名，黃庭堅採用相對修辭，以短對銳，以薄對厚等，其意謂周敦頤不欲求取功名，要突顯周子之廉。若如《宋史》謂其廉於取名則為不詞，仍當作「短於取名」為是。至於究竟是不是刻意改廉為濂？清儒周廣業總結說：

黃庭堅從父廉，字夷仲，官至給事中。周濂溪本作廉溪，山谷改書加水。林栗江州學廉溪祠堂記云：濂似廉而不新，魯直避其從父之諱改焉。廣業案：山谷集有上叔父夷仲詩，是不諱字。<sup>130</sup>

周廣業從《山谷集》中的用字，歸納黃庭堅自己尚且未避叔父廉字之諱，否定林栗改字之說。但即使山谷自己不避廉字，亦不表示周氏兄弟就不會故意為奉承黃庭堅而改。只是早在周敦頤與友人唱和詩中，就已多見用濂字，不太可能如林栗以為周氏兄弟自己所改的說法。

周氏兄弟二人雖對父親聲名有傳播之功，但宋以後儒者大抵意在指責周氏二子不能正確表達父親不忘本之態度，如黃震《黃氏日抄》即說：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晦菴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以志廉，豈濂溪二子壽、燾亦不詳家世之舊居以告耶？<sup>131</sup>

黃震以為黃庭堅雖傳神展現出周敦頤的形象風範，但以廉節標榜周子，不能詳盡表達取名自故里的深意，甚至懷疑周壽兄弟並不了解周子的家世背景。其實何奔在〈營道齋序〉中便已如此質疑二子，朱子更說「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sup>132</sup>也把過錯歸咎給兩個兒子。明儒王廷相則把話說得更重：

<sup>130</sup> 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抄本），第827冊，卷38，頁17上。

<sup>131</sup> 宋·黃震：《黃氏日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8冊，卷65，頁1下。

<sup>132</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40，頁1739。

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sup>133</sup> 這些責備之語，主要因為周壽、周燾與文人墨客過於親近，又好禪學，無法繼承父親理學正統之大道思想。因此，何弃原本說二子不達父親之意，漸漸演變成二子不能繼承發揚周敦頤道學思想的批判。

後世以濂學作為周敦頤理學學派之名，無論濂字是周子自創或取自故里，濂字能否代表周子人格風範，也是一個頗受學者討論之議題。周敦頤自己亦嘗作〈拙賦〉，採大智若愚之意。然不論濂字或拙字，皆曾受學者質疑，如黃庭堅在序文便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對茂叔之美。』」<sup>134</sup> 黃庭堅認為濂取義於廉，標榜此字，可有律貪之效。但他又說曾有感嘆溪名不足以表現茂叔之美者，意謂周敦頤的成就不該只在廉節而已，應有更崇高的形像，所以當黃庭堅以光風霽月形容時，便馬上得到理學家普遍認同。宋王子脩〈題祠堂〉詩便云：「先生粹德妙難名，霽月光風狀未成」。<sup>135</sup> 朱子也說：「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袖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sup>136</sup> 朱子以為時人對周敦頤的稱頌皆未能掌握到其思想之真義，極讚賞黃庭堅「光風霽月」的形容，將使「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sup>137</sup> 他並於〈六先生畫像贊〉中以「風月無邊，庭草交翠」<sup>138</sup> 形容周子之氣象風範。另外《延平答問》載李侗亦相賞讚揚此語：「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

<sup>133</sup> 明·王廷相：《雅述》，《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明嘉靖17年謝鑑刻本），第938冊，卷下，頁47下-48上。

<sup>134</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7，頁15上。

<sup>135</sup>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卷11，頁548。

<sup>136</sup>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冊，卷93，頁2357。

<sup>137</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78，頁3910。

<sup>138</sup> 同前註，卷85，頁4209。

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sup>139</sup>以風月形容周子者，尚有程顥所說：「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sup>140</sup>二程的吟風弄月是指與周子談論時的氛圍，甚至堪比孔子與曾點。這些稱頌語皆意在要更能精準抓住周子崇高的境界形象，亦隱含對於濂字不足表述周子人格風範的質疑。

對於濂字最直接的批評，首見於南宋林栗〈江州州學先生祠堂記〉，他指責濂字字義不佳：

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濂者，其音切義訓，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也。有檢、儉之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截然介辨之義也。濂與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有里參翻者、含鑿翻者，其訓曰：薄也。又曰：大水中絕，小水出也。予異焉，曰：是安取此？問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父之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忽也。東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為濂，則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絕物，殆為陳仲子之操乎。地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外，遂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絕之累，將非後死者咎與！予是以正之。<sup>141</sup>

林栗批評以濂字命名既狹隘又錯誤。他從音讀及訓詁入手，指出濂、廉雖同音，但兩字之義卻是全不相類。濂又另有里參切、含鑿切兩種讀音，分別解作薄、絕，故濂字根本就是一個不好的字。以濂代廉，將導致由廉之儉轉而為濂之薄，或由廉之清導致濂之絕，變成《孟子》所嘲諷的陳仲子。林栗又受傳言影響，

<sup>139</sup> 宋·朱熹編：《延平答問》，《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冊，頁322。

<sup>140</sup> 宋·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朱子全書》，第12冊，卷1，頁926。

<sup>141</sup>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第8冊，卷10，頁1下-2下。

指周敦頤本名溪為廉，二子刻意要迴避黃庭堅從父名諱，故意改廉作濂，才有這種不好的含義。林栗的言論引發朱子疑慮，〈答汪尚書〉說：「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為害道，尤可駭歎。」<sup>142</sup>朱子在駭歎之餘，亦曾與之論辯：「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為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與專說合。」<sup>143</sup>林栗的薄、絕之說，出於個人刻意引申推論，加上他是反道學、詆朱子的著名人物，可能出於立場關係，遂有這種激烈的貶抑用詞。

無論自製說或故里說，皆需處理濂字之字義解釋，以及唐宋以前究竟有無濂字這兩個問題。林栗所謂濂有薄、絕之義，其實是將濂字當作濂字解釋。對此，樓鑰《攻媿集》便說：

濂谿之濂，字書所無。鑰少時見林侍郎黃中知江州，曾作〈濂谿祠堂記〉，……其中亦似說濂字如元次山之唐崑崙，出于意見。近歲得晁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濂从水从兼。徐本曰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徐本闕濂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說。……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鑰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三月云云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于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sup>144</sup>

依樓鑰所說，南宋字書雖無濂字，但晁說之曾見唐代舊抄本《說文》在濂字下標明「或从廉」，是以濂字乃自古有之。濂與廉為異文，有薄冰、中絕小水、

<sup>142</sup>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卷30，頁1147。

<sup>143</sup> 同前註，卷81，頁4010。

<sup>144</sup> 宋·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3冊，卷66，頁14上-14下。



淹、水靜之義，不僅只是林栗所說的薄、絕而已。晁說之、樓鑰等人雖認為唐代即有濂字，但畢竟今人已無法得見舊抄本《說文》，其說亦難令辨者信服。

宋濂曾寫過〈鄭氏名濂解〉，解釋濂字之義，其開篇即說：「余友鄭仲德氏閒叩余曰：幸與子同名濂而論者屢病濂字之義無據，子亦知有其說乎？」<sup>145</sup>據此看來，濂字字義確實頗受後人挑剔，甚至認為是於古無據之字。宋濂既亦名濂，自然盡力維護此字，於是他作了一番考證：

濂字始見於《周禮》之輪人，其文曰：「雖有深沈，亦弗之濂也。」鄭玄借作粘音，《注》謂泥不粘輻是已。許慎《說文解字》唐人所抄舊本則曰：「濂，力聿反。從水，從兼。或從廉，薄冰也。一云中繩、小水，又云淹也。」徐鉉所定新本則又曰：「濂，力鹽反，從水兼聲，薄冰也。一云中絕小水。」不言或從廉。以余觀之，水必水字之誤，繩必絕字之訛。所謂濂，則水之淺薄者爾。由其淺薄小水，故中絕也。……又按顧野王云：濂與濂同，里兼、里忝、含鑿三反，薄也。大水中絕，小水出也。其說與鉉正合，豈鉉之所校定者，實有本於此耶？……至若晁說之謂濂字從兼，亦本文廉字，非兼并之兼者，固不察兼乃諧聲之義。而樓鑰所云，字書無濂字。林黃中疑後世所加。若元結之唐晤語者，亦不考舊本或從廉，及顧氏濂與濂同之說。<sup>146</sup>

宋濂指出《周禮》及《說文》唐代舊抄本中均有濂字，大徐本《說文》則將濂讀為從水兼聲，收入濂字而無濂字。但他又引《玉篇》，認為濂與濂同，自古即有濂字。又據其所引資料來看，濂字有薄冰、中絕小水之意。不過他認為濂字不當作薄冰，應作薄水，因為淺薄小水，才能符合中絕小水的解釋。宋濂另提出《玉篇》的證據。他所見《玉篇》應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陳彭年重修之《大廣益會玉篇》，時代仍在周敦頤之前。但不只重修《玉篇》有濂字，今所

<sup>145</sup> 明·宋濂：《文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4冊，卷28，頁3下-4上。

<sup>146</sup> 同前註，頁4上-5下。

見原本《玉篇》殘本亦有濂字。清末黎庶昌所發現日本滕田氏《玉篇》殘卷寫本，便收有濂、濂二字，並有云：

理兼、理添二反，《說文》：薄水也。或曰：中絕小水也。〈蒼頡篇〉：濂，淹也。《廣雅》：濂，清也。《太玄經》：濂然能自裁。宋忠曰：濂然，恬靜皂（貌）也。野王案：王者之政太平則有河濂海夷之瑞是也。《聲類》：冷水濂物也。音含鑿反。<sup>147</sup>

濂字下則說：「字書亦濂字也。」<sup>148</sup>從黎本的內容來看，《說文》對濂字的解釋為薄水，便與宋濂的推測相符。但黎本是據抄本或影寫本刊刻上木，並非原書照像或影印，偶有失真處，未可全然據信。《續修四庫全書》則根據日本昭和八年京都文化學院影印出版的東方文化叢書之原本《玉篇》殘卷再行影印，確實也收有濂、濂二字，字形分別為濂、<sup>149</sup>濂。<sup>150</sup>至於濂字的解釋，此版文字稍嫌漫漶，薄水作「薄·水」，<sup>151</sup>看來仍是冰字。因此，若要作水流來解，應該就只能取中絕小水的意思。

今日所見《玉篇》殘卷皆為日人所藏之古寫本，至於究竟是何時的寫本？雖無明確證據，但黎庶昌、羅振玉、楊守敬等人，皆認為是隋唐間手抄本，甚至是唐高宗時孫強上元本增字前的版本，那麼濂字確實早於周敦頤出現，為濂字異文。盧文弨《龍城札記》便有〈濂為濂之重文〉一文，他說：

今《說文》無濂字，晁以道得唐人說文本，以校徐鼎臣本，著《參記許氏文字》一書，共三冊。樓大防曾見之。……大防案：「《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濂水，注云：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於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

<sup>147</sup> 南朝梁·顧野王編撰：《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61。

<sup>148</sup> 同前註，頁361。

<sup>149</sup>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殘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8冊，卷19，頁434。

<sup>150</sup> 同前註，頁435。

<sup>151</sup> 同前註，頁434。

既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據此則周子之濂谿，與元次山之唐崑崙出於意見者，自不同。<sup>152</sup>

盧文弨引樓大防按語，認為依唐寫本《說文》來看，早有濂字。雖然他們依據之唐寫本今已無法睹其全貌，但無論是樓鑰、樓大防等，皆相信晁以道的證據，並認定周敦頤命名濂溪，並非無中生有，乃本有之字。

宋濂該文最後還有一段文字也值得提出：

此字本無深義，特以濂溪周子而顯。以濂名溪，乃道州營道縣小澗。去州城之西二十里而近，初亦以小水得名。胡理云：楚、粵之間，方言謂水小者為濂，亦一證也。周子家於是溪之上，晚寓九江蓮花峰下，不欲忘其初，遂用故里之號，亦以濂名溪。黃庭堅作濂溪詩，則謂溪名周子之所自取，而濂為清廉之義，則其說尤異於所聞也。余老且多病，舊學廢忘，十至八九。其言雖覩縷不輟，未必可徵仲德，尚求大雅之士而正焉。不須病濂字之義無據，而期師法濂溪其人，斯可矣哉。<sup>153</sup>

宋濂又說楚粵方言有謂水之小者為濂水，亦也可證濂水、濂水乃小水之意。《說文》及《玉篇》殘卷的中絕小水，其意當如重修《玉篇》所說：「大水中絕，小水出也。」<sup>154</sup> 蓋支流小溪之意。故依宋說，濂溪本義為小水，既非周子媿水而成，亦不是故里做元結取名遺俗而得。其實就元結七泉中的泉名本義來看，亦非皆由他所獨創。七泉中有五泉是由元結新取名，但形義仍有所本。如洧字，《說文》云：「洧，洧水也」，<sup>155</sup> 乃水流之名，《爾雅》則釋作草名。又如沔為方之或體，方之本義為併船，沔則有用作水名者。漣字，《說文》則以為是「漣水，出廬江入淮」，<sup>156</sup> 也不是道州本有的水流。可見這些字原本

<sup>152</sup> 清·盧文弨：《龍城札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抱經堂叢書本），第1149冊，卷1，頁11上-11下。

<sup>153</sup> 同註145，卷28，頁5下-6上。

<sup>154</sup> 宋·陳彭年重修：《重修玉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4冊，卷19，頁8上。

<sup>155</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一篇上，頁57下。

<sup>156</sup> 同前註，頁31上。

就是某些溪流之名，只是因其右文偏旁，便被文人雅士附庸風雅而成新義。故濂字應該與洧、沔等字相同，就其本義來看，此字當產生於隋唐之前，並沒有什麼深刻意涵。反而是周敦頤刻意取偏旁並引申成廉節意，等於是在本有之字上重新創造出新義。

## 六、結 論

本文主旨在分析濂溪取名之合理解釋，所論雖似小題，但濂溪之命名源由一直是儒者論述周子時注重的議題，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影響也相當豐富。且本文在論述此主題之外，亦考察出周敦頤二子相關行誼，周子故里地名的變化以及學者論辨濂字字義的發展，也為周敦頤的研究提供除學術思想之外，由濂溪現象所發展出的另一種文化模式。至於本文對濂溪命名爭議及對後世造成的影響所進行之考察，則可得出以下數點結果：

第一、依黃庭堅的解釋、周敦頤兩個兒子為父親宣傳的內容以及周敦頤友人往來詩歌來看，以濂寓指廉節，確實是周敦頤命名時所要賦予之義涵。

第二、朱子友人根據實地考察，發現周子故里也有濂溪，於是提出周敦頤將道州濂溪命於九江濂溪，象徵不忘其本。然若進行心理推敲，應是朱子等人根據傳統觀念、個人情感經驗，帶著主觀色彩的判斷，並無客觀文獻可證明周敦頤具有不忘其本、樂其所自生、志鄉關在目的思緒。

第三、朱子等人推測周敦頤心理的結論雖無根據，但他們的實地探察，既有證人，也有證據，不可因未見資料而輕易否定前人的論述。

第四、自朱子確認濂溪為周敦頤故里後，文人也由此發展出對其故里探訪的興趣，甚至產生出許多故里不曾實有的相關傳說，進一步豐富濂溪在文人心目中的文化地位。

第五、在目前可見唐寫本《原本玉篇》殘卷中收有濂字，為濂之異體，意指小水。則營道故里有水流名為濂溪，非意外之事。結合朱子一系的實地考察，可以承認營道故里實有濂溪。

總合上述結果來看，濂溪雖應為故里之名，但並無特殊意涵，只是一般溪流名稱。且就周敦頤所遺下詩文來看，也未見他有特別的思鄉情緒，所以不忘其本說並無根據。那麼結論便可以推導為：周敦頤雖採故里舊溪之名，但他並不取溪水本名之義，而是根據自己的志向，模倣元結，轉化濂字賦予廉節之新義，這也與他的〈愛蓮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周敦頤並且著重將此志向告知友朋，於是諸友紛紛以廉德為旨，寫作稱述周子人格。至於究竟是否為故里舊名？並非他們關注的議題。周敦頤應該也未曾特別提過，所以兩個兒子自然承襲其廉節重點，進而讓黃庭堅道出以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的詮釋之說。如此來看，黃氏的媿水說未必是就字形的新創來說，而是詩人對周子用字新意的文學化描述，因此後世學者所謂的自製取名，實乃誤解之說。

（責任校對：王誠御）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班固：《漢書》，收入《百衲本廿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影印宋景祐刊本，第4冊。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大化書局，1989年，影印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大化書局，1989年，影印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
- \* 南朝梁·顧野王編撰：《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殘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8冊。

- 唐·房喬等撰：《晉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56冊。
- 唐·元結著：《新校元次山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87冊。
- 宋·陳彭年重修：《重修玉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24冊。
- \* 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8冊。
- 宋·陳舜俞：《廬山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85冊。
- 宋·陳舜俞：《都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096冊。
- 宋·蘇軾：《東坡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07冊。
- 宋·蘇軾撰，施元之注：《施注蘇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10冊。
- \* 宋·黃庭堅：《山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13冊。
- 宋·黃庭堅撰，史容注：《山谷外集詩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13冊。
- 宋·黃庭堅著，史季溫注：《山谷別集詩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13冊。
- 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元刻本，第26冊。
- 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23冊。

- 宋·釋道潛：《參寥子詩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宋刊本，第29冊。
- 宋·釋普濟撰：《五燈會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053冊。
- \*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第8冊。
- 宋·朱熹編：《延平答問》，收入朱傑人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冊。
- 宋·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收入朱傑人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冊。
-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53冊。
- \* 宋·度正：《周敦頤年譜》，收入宋·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冊。
- 宋·黃震：《黃氏日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08冊。
-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207冊。
- 元·王義山：《稼村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93冊。
- 元·脫脫：《宋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影印元至正刊本，第43冊。
- 明·李賢：《明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73冊。
- \* 明·宋濂：《文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224冊。

- 明·姚昺：《永州府志》，明弘治 8 年刻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址：<https://www.ndl.go.jp/>。
- 明·王禕：《王忠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26 冊。
- 明·王廷相：《雅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938 冊。
- 明·張以寧：《翠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26 冊。
- 明·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87 冊。
- 明·徐弘祖著：《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 明·戴銑：《朱子實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明正德 8 年鮑雄刻本，第 550 冊。
- 清·邁柱等監修：《湖廣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531 冊。
-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清道光 24 年鄧氏小九華山樓刻本，第 1690 冊。
- \* 清·李紱：《穆堂別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出版社，2002 年，影印清道光 11 年奉國堂刻本，第 1422 冊。
- 清·王懋竑：《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326 冊。
- 清·彭開勛：《南楚詩紀》，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與《楚南史贅》合刊本。
- 清·方文：《蠡山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清康熙 28 年王槩刻本，第 1400 冊。



- \* 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抄本，第827冊。
- 清·盧文弨：《龍城札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49冊。

## 二、近人論著

- 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孔煜華：〈濂溪辨〉，《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 \* 王晚霞編著：《濂溪志新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 吳 懌：〈周敦頤「濂溪」之名考辨〉，《南昌高專學報》2005年第5期。
-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張官妹：〈「濂溪」之名緣由〉，《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5年2月）。
- \* 梁紹輝：《周敦頤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
- 錢 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9年。
- （說明：書目前標示\*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u, Zh. (2009). *Zhou Dun-Yi nian pu* [A chronicles of Du Zhou Dun-Yi's lif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Gu, Y.-W. (1985). *Yuanben yupian canjuan*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 Huang, T.-J. (1983). *Shangu ji* [A collection of Huang Ting-Jian's works].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 dynasty)
- Li, F. (2002). *Mutang bie gao* [A collection of Li Fu'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Liang, Sh.-H. (2002). *Zhou Dun-Yi ping zhuan* [A comment of Zhou Dun-Yi's lif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Song, L. (1983). *Wenxian ji* [A collection of Song Lian's works].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Wang, W.-X. (2019). *Lianxi zhi xin bian* [A new collection of Lianxi's hist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Zhou, D.-Y. (2004). *Yuan gong Zhou xiansheng Lianxi ji* [A collection of Zhou Dun-Yi's works]. Beijing: Xian Zhuang Bookstor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Zhu, X. (2000). *Zhu Xi wenji* [A collection of Zhu Xi's works]. Taipei: De Fu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 Zhou, G.-Y. (2002). *Jing shi biming hui kao* [A discussion of how to avoid real nam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